

学科思想史丛书

哲学社会科学系列

中国文学 思想史

上卷

ZHONGGUO WENXUE SIXIANGSHI

敏泽 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学科思想史丛书

哲学社会科学系列

中国文学 思想史

上卷

ZHONGGUO WENXUE SIXIANGSHI

主 编 敏 泽

本卷作者 李 诚 刘汉忠

胡大雷 张海明

唐晓敏

湖南教育出版社

丛书总主编：汝 信

丛书总策划：陈民众

本书组稿：刘清华

本书责编：陈民众 刘清华

特约编辑：戴 维

总序

汝 信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湖南教育出版社的策划、组织和支持下，《学科思想史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我国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著作中，从学科的角度去探讨学术思想的发展尚不多见，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按原来的设计，这套《学科思想史丛书》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丛书的宗旨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并重，这也是它的鲜明的特点之一。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有不少人对哲学社会科学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 and 作用是认识不足的。他们往往从狭隘的实用的观点出发，错误地认为哲学社会科学没有多大用处，因此他们比较重视自然科学和技术，而忽视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轻视那些从事基础性研究的人文学科。这样，就在社会上造成“重理轻文”的倾向，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十分不利。针对这种错误认识，党中央和江泽民同志近年来曾多次强调指出，要从整个国家建设和发展需要的高度去正确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必须同样重视发展科技和哲学社会科学，并提出了“四个一样”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振兴，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之林，不仅需要大力发展自然科学，而且同样迫切需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举，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和理论可循。这就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断努力进行探索，在丰富的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又把新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在这个实践和理论的循环往复的双重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都应积极参与和发挥作用。再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应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奠定思想基础，是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直接影响到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推动全社会的文明向前发展。所以江泽民同志明确地指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这两个“不可替代”，充分说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所应有的位置。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又再次重申，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学术界正在努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十六大的精神，加强和加快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大好形势正在形成。《学科思想史丛书》的出版，对于广大读者了解哲学社会科学一些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而加深理解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顾名思义，学科思想史是以学科为研究对象去探索该领域内学术思想的发展，从学科成长的历史和现状中去揭示思想演进的线索和轨迹。它和学科本身的历史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所区别。学科史着重描述各个历史时期内该学科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并给予适当的评价，而学科思想史则把研究重点放在与学科发展相应的学术思想、观点、方法上。在某种意义上说，编写学科思想史可能比学科史的难度更大。出版《学科思想史丛书》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从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来看，它的各个学科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在历史上，这些学科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认识的前进步伐而发展演化的。认识起源于实践，正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人类逐渐增加对自然、社会和人自己的认识，开始由零散、片断、肤浅而后来则越来越深化、系统化，最终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而构成独立的学科。一般地说，人类早期的认识往往是综合性的，涵盖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在有些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有关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的问题都交织在一起，虽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但还没有分化成各个独立的学科。例如，在古代希腊早期思

想中，后来被人称作“哲学”的“爱智慧”这个词，实际上就包括了当时的所有知识和学问，从天文、地理到人生哲理、宗教、讲演、修辞、写诗、治病等等几乎无所不包。那时不仅没有各个独立的学科，甚至连学科的概念也还没有产生。柏拉图开始意识到各门知识之间应有所区别，所以他在各别的对话中专门讨论某个方面的问题。但是，真正对各门学科作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的还是亚里士多德。他集古希腊学术之大成，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巨人。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他明确地把知识分为三大类：理论的、实践的和创制的。理论知识又可分成三类：哲学、数学和物理学。实践知识也分为三类：伦理学、政治学和家政学（即经济学）。创制知识则包括诗学（文艺创作）和修辞学。亚里士多德还系统地研究了逻辑学，把逻辑学看作研究一切知识的必要的思想工具。他具有十分渊博的知识和学问，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几乎对哲学和科学文化的各门知识都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使它们初具学科形态，他可以说是许多学科（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而且也包括自然科学）的创立者。

在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十分缓慢，甚至陷于相对停滞的状态。神学在中世纪的欧洲占绝对统治的地位，这对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也明显地阻碍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正常成长。当时的文化教育机构为教会所垄断和控制，教会学校以神学教育为主，设七门必修学科，即所谓“七艺”，包括文法、修辞、逻辑（称“前三艺”）和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称“后四艺”），更高级的教育则只有供少数人深造的神学。一些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也只有借着神学之名在神学所允许的范围内来研究探讨，这样的话，当然也不可能建立起独立的学科。直到12世纪后欧洲世俗性的大学大量出现，开始打破教会对文化教育的垄断，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善。在欧洲基督教世界久已失传的许多古希腊罗马文化典籍，其中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不少著作，靠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维护才得以保存和研究，如今通过翻译又重返欧洲各个大学。大学的创立是当时教育体制和科学研究方面的重大变革，它改变了以前宗教教育

的封闭狭隘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传授“七艺”和神学知识，而开创了一种规范的世俗化、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并且成为新的科学研究的中心。大学按专业设立一些学院，增加不少世俗实用学科，为社会培养大批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的人才，也把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哲学社会科学真正的大发展以及各门学科逐步成熟而最终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主要地却发生在 17、18 世纪以后。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欧洲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则揭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欧洲社会的面貌，无论从经济上或政治上都造成了影响十分深远的巨大变革。新的形势向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社会变革而产生的大量新问题迫切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从理论上做出新的解释并在实践中加以解决。这不仅使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传统学科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且还促使一批新学科的诞生。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以后，人类历史发生巨大变动，哲学社会科学迅速发展，对社会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一些新兴学科正方兴未艾，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

纵观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学科的产生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它们本身是历史的产物。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上层建筑 and 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其本身的发展有前后继承的关系，但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基础制约并为之服务的。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形成必须有思想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充分积累，如果没有这种积累，一个独立的学科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学科的建立往往是一些杰出的学者在前人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发展的结果，对有的学科来说，学者个人所起的作用确实是十分巨大的，我们今天研究学科思想史也离不开探讨那些杰出人物的学术思想。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发展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需要。恩格斯说过，由于社会需要而推动科学前进的力量胜过十所大学。这是至理名言，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而且也同样适用于哲学社会科学。在近代和现代出现并得到蓬勃发展的一些学科如社会学、

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传播学等等，正是充分的明证。首先是有强烈的社会需要，存在着不得不认真地研究解决的紧迫的社会问题，才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学科的成长。研究学科思想史，不能单纯地从思想到思想，而必须紧密地联系社会实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去探索思想发展的脉络。

当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科发展一直在继续进行，呈现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趋势。首先是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学科研究的不断分化和不断综合的趋势在同时发生。一方面，由于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学科研究的分化和越来越专门化日益加剧，不断分化的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当代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又不是某一门学科能单独解决的，而需要多学科的广泛合作，综合应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对问题进行整体化的研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当然，现代科学科学的这种综合化趋势，是在各个学科的进一步分化和高度专门化的基础上出现的，二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除了由学科分化产生的分支学科外，又出现了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领域，即使某些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学科，也通过与其他学科的结合而衍生出一系列新的分支学科。这种丰富多彩的局面是过去从来没有的。

其次，另一个重要趋势是两大科学门类，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正在不断加强。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正在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去，而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新成就、新思想也反过来影响自然科学的发展。当代某些最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正是出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和相互联系的交叉点上。应该说这是一个有益的发展趋势。广义的科学本来就包括关于自然界、社会 and 人的研究，因此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应该是相互协调和相互统一的。过去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分离，在当时历史条件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确实有力地推动了自然科学的独立发展，摆脱虚幻的自然哲学的影响，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经过长时间的分离和独立发展，现在也许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重新结合起来的时候了。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因此自然科学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他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①当然，从目前看来，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融合决非一日之功，但这是否代表未来学科发展的大方向呢？恐怕只能由历史来证明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8页。



尽管对于思想史的关注，一直是史学发达得比较早的我国史学的一种历史久远的传统，早期的《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礼记·学记》等等，都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史的内容，可以看作实际上是后世的思想史之类著作的滥觞；再以后的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以及各种“学案”之类的著作，既包含着丰富的学术史的内容，也包含着思想史的内容，但它们毕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思想史。科学的思想史的研究及其著作的出现，是晚近的事情。

如果说在我国真正思想史的研究起步较晚的话，那么作为整个思想史一个分支的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起步就更晚。譬如说，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已经出现了梁启超在 1922 年发表的《先秦政治思想史》^①、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②、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和《中国思想通史》（全国解放之后，更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充出版了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杨荣国也于 1952 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但在文学方面，尽管在 20 世纪的 80 年代之前，已经有林传甲、黄人、曾毅、谢无量、胡适、郑振铎、胡云翼、刘大杰、陆侃如、冯沅君、游国恩等的各种类型的文学史著作数十种出版，但文学思想史一类著作的出现却只是近年的事情。虽然前此的一些文学史在撰写中已经注意到了文学思

^① 《饮冰室专集》卷五十，上海中华书局 1936 年版。

^② 北平人文书店 1936 年版。

潮和文学思想在文学史发展中的作用。例如 30 年代胡云翼在《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① 中就曾说过，文学史的撰写不能只“偏重于死板的静物的叙述”，而“于各个时代文学思潮的起伏”等等以“非其熟知”而不加注意；刘大杰在 40 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② 中，就比较重视在政治、社会以至文学之间作为中介的“文学思潮”的重要作用的分析等等，为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积累了可贵的历史经验，直到 1949 年开明书店才出版了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但毕竟缺乏文学思想史方面的专门著作。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文学思想史的兴起很晚这一事实，使这一学科在起步阶段遇到了许许多多以前未曾注意或深入探索过的问题。诸如何谓文学思想史？文学思想从发生学上说是怎样产生的？文学思想史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它与文学之外的种种思想史，特别是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思想史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与文学的其他与之紧密相联的学科，譬如说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它的最基本的特点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问题都是需要多方面的、长期的努力，才能较好解决的。

二

文学思想史是研究文学这一学科思想的萌芽、发生、发展及其演进的历史，是被把握在思想史中各个历史时期文学家关于文学问题的种种历史性思考。

“文学”这一词汇虽然在我国出现很早，在先秦的典籍中已普遍出现，如见于《论语·先进》的“文学，子游、子夏”，见于《墨子·非命中》的“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这里所说的“文学”并非像有的美学家所解释的那样，是所谓的政论性文章。其实，它泛指文献以至儒学，甚或一切文物典籍，并非后世所说的文学。“文学”作为一

① 北新书局 1932 年版。

② 中华书局 1941 年版。

种独立的学科，虽然出现得较晚，但文学与文学思想却出现得相当早，以文学的发生来说，几乎可以说与人类的诞生同步。所谓“民生而志，咏歌所含”^①，“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②，“讴歌之初，则疑其起自大庭之时矣”^③。“大庭”或谓神农之号，或谓在传说中的黄帝之前。总之，年代很久远，甚至在人类一诞生诗歌也就随之诞生了。

而文学的诞生与发展，也就必然地伴随着文学思想的诞生和发展。从现存的我国最早的诗歌中，我们就可以鲜明地看到作为文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人类早期关于文学的宗教的、愉悦的、养生的、抒发情怀的种种社会功用的肯定^④。这一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本身也就决定了：为了科学地探讨和论述文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就不可能舍其孕育和萌发阶段不谈，这样就不可能成其为完整的学科思想史。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文学史或文学思想史时，常常普遍地忽视了这一点，这是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的。而忽视了学科的发生学的真正研究，难免会使研究成为无本之木或无源之水，不能给人以科学史的全貌性认识。

三

文学思想史的研究，除了科学地分析文学思想的发生问题之外，它作为文学的学科之一，认真研究并解决它与文学的其它学科，以及它与其他相邻的文化、思想学科间的关系问题，不能不是需要认真注意的。

这就首先需要对文学思想作一个简单的解说。所谓一定的文学思想，其核心构成就是一定的文学观念群中的主要的或主导文学思想观念，它影响着一定时期的价值取向、审美风尚、理论批评范式，以至文体风貌、艺术形式，使其区别于它之前或它之后的其他文学风貌。因此，文学观念群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的改变，必然会导致文学思

① 《文心雕龙·明诗》篇。

② 《宋书·谢灵运传论》。

③ 郑玄《诗谱序》。

④ 参阅笔者与人合著的《文学价值论》导论中的《文学价值观念的萌发》。

想的改变，反之亦然。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文学思想史实际上也就是文学观念史。

一定的文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与一定的哲学、社会、文化思想总是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一定的社会政治思想在价值取向、特别是精神心理气候方面对文学的影响虽是无形的，却常常是十分深刻的，尽管西方当代的许多“主义”，从结构主义直到阐释学都竞相切断一定文学思想与一定的社会、文化思想之间的脐带，但这一影响是割不断的。譬如说，明代前后七子崇尚汉、唐的拟古主义而贬低宋以后的诗，认为其原因在于“反对理学对文学的干预”，这样的阐述恐怕就很难说是确切的。而换个视角，如果从明初的社会文化思想来观察，这个问题就是十分明白、并且易于理解的。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自从如日中天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大一统的唐王朝成为历史的过去，历史进入了10世纪下半叶之后，半壁江山之憾，成为跨越两个世纪的两宋汉族士人噩梦般的遗恨：由少数民族为主的辽、金，占据着北方中国的半壁江山，接着便是蒙古族对于中国的百年统治。连续4个多世纪，中华大地要么处在少数民族的不断割据侵扰的情况下，要么完全处在他们的统治之下。我们今天来评价这一历史现象，能够充分认识到它在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国家的形成、发展、以及国内多民族的文化融合方面的积极意义是一回事，当时人们的历史认识又是一回事。明王朝的建立，在汉族人来看，是风风雨雨噩梦般的400余年后，他们梦寐以求的精神追求的真正实现，它是汉族继汉、唐而后在中华大地上所建立的第三个大一统的王朝。因此，它一建立，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被提到议事日程上的大事之一，就是要恢复汉族统治时期的光辉传统，一洗所谓“胡元”之旧。所以在明人眼中，代表中国极盛时期的汉族统治的唐代，就成了事事必须效法的榜样，或者再上溯一步，推及赫赫的汉王朝，并一再下诏推行这一政策，这就是文学上以恢复汉、唐之旧的复古主义思想的社会土壤和文化依据。在文学史上，这类例子是很多的，这里没有必要一一列举。以往的研究，人们是重视这方面的分析的，尽管这类研究中常常伴有庸俗社会学和简单化的情况，甚至有以社会分析代替文学分

析的情况，但不能因噎废食，因此走向另一极端，排斥和轻视在研究文学和文学思想史时必要的社会文化思想的分析，这并非研究文学和文学思想史的科学的态度的态度，因而是不足取的。“文变染乎世情”^①，这可以说是不刊之真理。

西方本世纪兴起的力图割断文学与生活 and 思想相联系的天然脐带的理论，它们的风行主要是在 20 世纪中期以前，由于他们的理论中包含着先天的致命的缺陷，到 20 世纪中叶以后，尽管在我们这里，在 80 年代的“方法热”中曾经把它奉为圭臬，但在西方，情况却很不相同，不仅像阿尔多诺、马尔库塞，以至新历史主义等等，都对形式主义的片面性有尖锐的批评，即使是早期的倡导者如结构主义者托多罗夫，在进入 80 年代后也反戈一击，在其《批评的批评》一书中，认为割断文学与社会的内在联系，是形式主义文论的致命缺陷，这是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的。

不只是文学思想的发展与社会文化思想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它还要受到哲学思想发展的深刻的影响。我国的理性意识不仅起步早，且成熟早，影响大。我国文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始终受着我国哲学文化理念及其演变的深刻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文学思想的发展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江左篇制，溺乎玄风”^②，“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③，和当时思想领域内的“贵黄老”、“贵玄”的思潮就是分不开的。玄学的兴起，几乎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内）的心态。同样，宋诗的重理，“以理为诗”，等而下之的甚至“以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为诗，也与宋代理学的兴起分不开。左派王学的兴起与发展对明代中后期文学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刻的。这都是不必详加论列、分析的。

因此，要知其人，就必须论其世，绝不可以轻视论其世对于论其人的意义。也因此，在文学思想史的撰写中，就既要充分地重视它与哲学

①③ 《文心雕龙·时序》篇。

② 《文心雕龙·明诗》篇。

及社会文化思想的联系，又要充分地重视其间的区别。

求实地说，文学思想史之与哲学、社会文化思想史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不大容易产生歧见的。首先是它们研究对象的不同，人们常常盛誉文学是人学，但此说远不如汉人翼奉所说的“诗之为学，性情而已”^①，或清人刘融斋所说的文学是“心学”^②，更为准确和恰切，即文学是以人的心灵和情感为对象的，丹麦的文学史家勃兰克斯在其《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引言中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这一论述也是完全切合文学史的实际的。这就不仅使文学与一般的学科严格区别了开来，也使它与其他以人为对象的学科（社会学、心理学以至病理学）严格区别了开来。文学的对象是独特的，研究它的思想史自亦不会例外。其次，文学思想史与一般思想史的关系是一种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它在整个思想史中的地位是独特的，却远不如哲学、宗教、文化等部分那么显赫和重要，因此，长期以来，不曾受到人们的重视，对它的研究，起步要比许多学科晚。

四

在与相邻近的各种学科的关系问题上，文学思想史首先必须认真解决的，是它与文学史和理论批评史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它们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是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忽视的，但它们之间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和区别，必须精心地加以辨析与区分，既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相同，当然在提到这些时要尽量笔精墨简；更要重视它们之间的不同和区别，划分和厘定要尽可能清晰和科学，这是文学思想史所面临的必须首先认真对待并加以解决的问题之一。

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思想史的关系，由于目前关于文学史究竟应该如

① 《汉书》卷四十五《翼奉传》。

② 《游艺约言》，《古桐书屋续刻三种》本。

何写，在理论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意见，因此，无疑为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增加了一定的困难，而且这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因为文学思想史作为一种新兴的学科，在理论探讨和写作实践两方面都还处于草创的阶段，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还有待于今后实践的检验，因而同样增加了问题的难度，这都是事实，不能回避。尽管目前国内也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有特点的断代文学思想史方面的著作，且颇不乏有益的探索和较好的经验，但还不能说所有有关的问题都获得了较好的解决，包括文学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内。客观上和实际上存在的这些困难，倒恰恰说明了研究它们之间关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需要更多学人在这一方面继续探讨。而且，对怎样进一步写好文学史目前尽管存在着众多的分歧和争议，但毕竟已往这方面已经有了大量而且长期的写作实践，积累了许许多多极其宝贵而有益的经验 and 需要引起进一步注意的缺失（例如：文学史常常被写成作家作品评论的汇集，缺少史的眼光和分析等等）。文学史与文学思想史二者的基本联系与区别，也还是可以分清的。首先，应该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文学思想史与文学史同样，都是以文学为其基本研究对象的，自然不能没有很多的相同部分和交叉，但是，细加辨析，在研究对象方面它们之间也还是有所区别的。文学史应该和必须研究的，应是人类的心灵情感表现的特殊形式的发展史，自然不应也不能将文学思想排除在外。但它所重点研究的，应是历史上各个时代的纷繁的文学现象及其发展的史的探讨、时代的精神氛围与文化气候对于作家的影响和关系、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和作家的产生、其思想艺术特点，它与前代文学的继承关系及其独特的创造，它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各种文学现象之间产生与递变的规律和发展的脉络，以及各种文学流派之间的差异等等。很明显，在文学学科的事实层面上，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比起文学思想史来要宽泛得多。

文学思想史与文学史的区别，不只是表现在研究对象上。研究对象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各自研究内涵与方法的不同。文学思想史与文学史不同，它虽然也不能离开对于文学现象、事实层面的考察，因为任何思想都不是悬空存在的。但是，文学史所应该关注的宽泛的事实层面的内

容，却并不都是文学思想史所应该重视与关注的。文学思想史如果过多地细地考察这些方面的问题，势必会使二者混淆起来。文学思想史所应该全力关注的，应该是在深入研究各个时代的重要文学现象，以及文学家、文学流派及其代表作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抽绎并梳理出文学作为一种学科思想的发生、发展的基本走向和脉络，它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以及这种丰富和发展对于学科思想体系的意义。它不同于文学史，不重点放在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文学家、作品及其影响等等这些基本文学事实的史的诠释和分析方面，而是以文学思想史发展进程为枢纽，对重要的作家、理论家及其作品的思想及方法的发掘和分析，与之无关的种种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及其影响等等，则应该舍而不录。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要写好文学思想史，作者本身就应该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与思辨能力，应该和必需站在比文学发展史更高的思想层面，来对文学思想史这一学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精神文化氛围中的发展、演变进行科学的综合、归纳和理论概括。它对文学发展的掌握和探讨，不仅是学术层面的，更是思想层面的。这也是文学思想史与文学史要求上的另一重要的区别。

作为精神现象学之一的文学思想史，自然更不同于自然科学诸学科的思想史，从自然科学的发展来看，学科史所侧重的应该是学科的知识层面的发展和演进，学科思想史所侧重的则不在“知识”本身，而在于“知识”形成过程的思想方面的原因和依据，即世界观、方法论方面的原因的分析与梳理，及其演变与影响的探求。对大多数自然科学的学科说来，学科思想史甚至可以称之为学科的重要思想、概念、范畴、方法等等的演进和发展的历史，对于一部分社会科学的学科来说，这样的界定也是合适的，如社会科学中之哲学、逻辑学等等，就是如此。但这一切对于文学思想史来说，却显然是不妥当的。这里至少有两点是必须十分明确的：第一，对于以表现人的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为特点的文学，我们是很难划分“知识”层面与“思想”层面，如自然科学那样的；第二，文学思想的发生与发展，并不仅仅是以理论形态存在的，以理论形